

比较文化视阈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梳理

王紫璇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401);

[摘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阈下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行理论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之比较为其现实背景,学习和汲取西方先进文化为其思维起点,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思考核心,融合和创新中西方文化为其理论趋势。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比较;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4.02.016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4)02-051-04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既是一个应用细化和赋予中国色彩的过程,也是一个补漏纠错和理论再造的过程”^[1],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比较、融合和创新发展的过程,具有丰富、独特、鲜明的文化特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经典同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首倡者,自然对中西方文化比较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述。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吸取和选择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为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方法论基础。

一、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比较是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背景

在东西方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不同,这主要和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沉淀相关联,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近代以前,由于中国和西方空间的隔绝,关系疏远,文化交往非常有限,造成中西文化各自“相安无事”地相对独立发展。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化伴随经济的工业化和军事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不断进行抗争的历史,更是中国人民不断学习西方器物、思想和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进行探索的历史。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与冲突的过程中,学会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期间经历了痛苦而又必然的选择,饱含着大量敏感的民族情绪。向西方学习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技术成果,即器物层;二是相关社会支持系统,即制度层;三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即思想层,也就是

关于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政治、思想文化的学习。中国人开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发展为“中体西用”,再到后来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如此发展过程中,中国人一边认识世界一边改善自身,迈出的每一步都体现了新旧文化的摩擦和碰撞:有吸收,也有摒弃;有“拿来主义”,也有盲目排外;有囫囵吞枣,也有水乳交融。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二是从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前一阶段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以“船坚炮利”为主的西方物质文明,后一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是西方精神文明,也就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民主与科学的近代中国思维体系,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冲击。处在运动前列的毛泽东,在文化冲突比较中做了大量的努力,试图解释一种历史的观念以及民族的命运,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走向。他探索的核心内容是在批判性地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进步文化,他反对囫囵吞枣式简单地拿来主义,而是在实践中创造中西交融、服务于中国实际的新型革命和建设理论,这一方面体现了他高瞻远瞩、正视现实的宏图远略,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尊重的民族情怀,也是他“重力行、重践履”的扬弃与创新。

二、学习和汲取西方先进文化是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起点

历史进入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和封闭落后,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发展的最大障碍和阻力。想要追求进步的中国人通过“开眼看世界”而觉醒之后,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的陈腐和愚昧,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学习和批判的大旗,在中国掀起了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资产

[投稿日期]2014-03-03

[作者简介]王紫璇(1992-),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

阶级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正在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青年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局限于中国文化的单向学习不免陷入狭隘之沼泽,应该在学习研究领先的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包容的吸取各种西方文化的长处。毛泽东反对闭关锁国,认为那种学习是无用的,强调“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2](P18)}。在此基础上,他致力于综合分析、研究比较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他一方面对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精神作了肯定,另一方面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进步文化作了大力批判;着力引进西方文化和主张,并把引进的内容很好地作了消化吸收。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过去对吸取外国的进步文化做得很不够,没有把外国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认为对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如我们今天用得着,都应该加以吸收。^{[3](P707)}这些观点的提出,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开放的文化学习意识和开放精神。

在上世纪初的文化激荡时期,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这一思想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能够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所以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迅速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至于为什么中国人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心甘情愿、无反顾地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而非借用众多西方其他思想武器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其实除了革命的需要,还有其传统文化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有些西方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例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讲过,有很多西方人想不明白,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能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中国是一个古老传统的东方民族,怎么会迅速接受这种初看起来迥异的、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很多西方学者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反而“妙极了!”就象自己的永恒哲学同现代科学的结合,是自己远去的東西又回到我们身边了!^{[4](P25)}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这种哲学思想正是来源于中国,它的根在中国。李约瑟曾经大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实渊源于中国,是耶稣会士将其介绍到了西欧,经马克思主义者们作一番科学化后,重又回到了中国。^{[4](P25)}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其根也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文明发展的硕果,它是近代文化发展史划时代的产物,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2](P18)}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艰难的文化选择时,首先考虑了文化

的时代性,所以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处在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学说,将其作为思考中国革命实际的逻辑起点,以后的长期革命实践充分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三、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核心

在学习和汲取西方文化先进因子和营养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忘记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在早期毛泽东尚未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曾宣称,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因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6](P474)},正可谓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P18)}。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在科学的文化观指导下,自觉主动、卓有成效地吸取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民主性精华”。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拥有许多珍贵的品质与丰富宝藏,有其自己的特点。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传统和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今日之中国为历史中国之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绝不能割断历史,自从孔夫子至孙中山,应给以总结,承继此一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实践,可提供重要帮助^{[7](P534)}。毛泽东善于汲取传统文化营养,借鉴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他倾其一生矢志不渝地通过借鉴历代古书古人的智慧和文化遗产,指点江山,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汲取思想灵感、文化营养和前进的动力。毛泽东遍览中国群书,涉猎层次广泛,并有评有用,这为其奠定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理论成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一生中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浸淫于中国儒学、佛教、道教等精英文化的熏染上,而且还表现为长期生活在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使他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深深热爱、情有独钟,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从民间文化对他的影响而言,毛泽东主要选择了代表中国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质朴简单品质、叛逆精神和要求平等的思想。就精英文化的影响而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代表,通过读书学习活动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来,成为毛泽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同时它们还体现在中国社会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准则、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等领域或层面之中,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既定文化环境,借助于历史沿革、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亲身实践等

方式而深入到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综上所述，毛泽东正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从多方面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对中国文化，既不应无批判的全盘继承，也不应全盘否定，而应进行批判的继承，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一贯的态度。毋庸置疑，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值得称道，但要看到其精华与糟粕俱在，有些在当时十分合理的因素，因为时代的变化，已丧失合理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在取得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认同的同时，还要对其糟粕的东西、过时的因素进行甄别和批判，这样方能把中西方文化连起一条交流沟通和融合的纽带。毛泽东在进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坚持批判与继承，这在他的实践中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毛泽东经过具体而深刻地分析后，认为：中国几千年之文化，虽打上了封建时代的深刻烙印，但也并非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反封建的东西，有人民群众创造的好的东西。须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分别开来。即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并非全是坏的，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要对其发生、发展时期的东西同灭亡时期的东西进行区别。封建主义，在其发生和发展之时，有很多东西还是很不错的。^{[7] (P225)}毛泽东还提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创造了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我们对古代文化应当梳理分析，分清哪些为封建性的糟粕，哪些又为可以吸收的民主性的精华。此诚为建设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前提、条件；一定要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文化同古代人民的优秀文化区别对待，特别是应吸收、继承那些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科学的文化观使毛泽东积极主动地去吸取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本身是一分为二、充满矛盾的，既有糟粕，又有精华；既有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也有积极向上的、可以为后人所用的健康有益因素。正是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确立了科学的文化观，毛泽东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

四、融合和创新中西方文化是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趋势

毛泽东融合中西方文化进行理论探索，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又融合了创新精神，是一种崭新的理论研究方法。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国外传来的思想理论，如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同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

能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源于德国，传于欧洲，毫无疑问是一种外来文化，其若欲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也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自己的结合点、生长点。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两种文化双向生成，双向选择，不是一方压倒或同化另一方，而是应该取他之长而补己之短，相互吸收和交融。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总结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时，就提出了符合中国人接受心理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具体分析道：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中国特点、民族形式；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如毛泽东所说的：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必须带有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7] (P1060)}

毛泽东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相互融合中创新，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进程而进行的。其间包括同以全盘两化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同以中体西用论为代表的保守的改良主义文化思潮，同共产国际中的托派机会主义，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歧见和斗争。通过这些歧见和斗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个问题，其中包含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的问题。比如：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与民族性、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他尖锐地反对洋八股和教条主义，让那些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要让那些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登上舞台。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7] (P1060)}。

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破”与“立”的统一体，“破除”的是中西文化的腐朽糟粕成分，“建立”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新文化，犹如涅槃后浴火重生的凤凰。从这层意义上说，毛泽东融合中西方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探索已经脱出了“中体西用”的沼泽，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毛泽东在此过程中体现了非同一般的超越性和前瞻性，将中西文化比较回归到现实的中国革命之中，全面、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化比较状态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显然，中西方文化融合具有先进文化的性质，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状态。融合和创新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情况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先进的文化理念,也应该是以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理论走向。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探索和实践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坚持中西方文化比较,从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在当时境遇下独树一帜进而全面超越,同样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当今时代,社会发展和变动极为迅速,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挡。中西方文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在进行冲突、竞争、比较和融合,而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影响在所难免。在日益开放的文化全球化环境中,马克思主义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了解和认识国情,反复不断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非凡的开放精神和伟大的自信心,秉持扬弃结合,推进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只有站在这一文化高度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保持中国特

色,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以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 [1]杨英法.《毛特概论》1章1节第2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历史经验[EB/OL]. 搜狐博客. [2013-3-14]. <http://yangyingfa.blog.sohu.com/146013409.html>.
- [2]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毛泽东成功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张允熠,张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研究[J].学术界,2007(6):25-28.
- [5]王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D].内蒙古大学,2009.
- [6]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7]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theory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ased-on the comparative culture

WANG Zi-xuan

(Institute for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plays the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O Zedong made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ased-on the comparative cultur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aking the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nking, made new tendency.

Key words: the comparative culture; MAO Zedo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上接第 50 页)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enlightenment

MA Jian-xin

(Politics and Law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Henan,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Emancipating the mind provide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of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requires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 truth from facts. Therefore, it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Emancipating the mind is the power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tage of our society opens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e new break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economic promotes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gives u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must adhere to emancipating the mind. At the present, we must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s the core,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epartments,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type government, persist in active and prudent policy.

Key Words: emancipating the mind; the reform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lationship; enlightenment